

新时代语境下主旋律电影的现实表达

□王文静

一百多年来,电影的发展历程也是社会文化语境与影像之间互动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内地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再次证明了电影是文化传播的优选价值。就创作层面而言,只有深刻反映时代风云和社会万象的作品才能具备经典价值,而任何一部影片都因其艺术旨归不会脱离它所诞生的历史时代而孤立存在。当前,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电影的发展也有了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即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通过电影传达文化自信,同时彰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让中国电影成为文化产业中的引领性产业,成为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文艺形式,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亮丽名片,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1987年,“主旋律”一词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被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成为当时的创作倡议。30余年间,“主旋律”创作传统对于展现大国文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视野发挥了明显作用。“主旋律”电影作为我国电影创作实践中的重要一极,也成为国家话语、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的“代言人”。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

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后现代主义文化加速了社会心理结构的转变,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性日益突出,产品化、游戏化、娱乐化和生活化迅速主导了当代大众文化,出现了以贺岁片为代表的商业电影。在商业因素与主题价值、艺术表现的轮番对垒中,一部分主旋律电影因其题材限制、宣教僵硬、人物扁平、表现手法单一等缺陷曲高和寡,即便不考虑市场表现,其主题设定与价值传播之间的裂隙也难以弥合。

从文化研究角度来看,这固然是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一次碰撞和摩擦,但与娱乐化的狂欢、解构和颠覆相伴生的还有新时代世界文化的变迁。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但通过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的提升获得了国际认可,同时还在寻求与“大国形象”对位的国际角色和实际作为。那么,中国价值的输出和文化传播成为大国形象落地的必由之路,传达中华民族精神内涵,呈现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气派,是中国电影作为文化传播载体和世界性艺术语言的重要转型方向。面对世界格局中综合实力与意识形态的同步博弈,电影创作在完成真实感人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的同时,必然附着以影像来建构新时代大国形

象的文化使命,从而解除世界范围内对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模糊与曲解。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传统主旋律电影逐渐拉开了与大众进行价值和情感交流的差距;另一方面,新时代国际文化格局对国家形象、国家话语的呼唤日益强烈。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前提下,中国电影必须在价值求同、类型叙事、延展视听等多个途径的探索中对传统主旋律电影创作进行改写,才能达到讲好中国故事、融入世界文化的愿景。

近几年上映的《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烈火英雄》等主旋律影片在票房、口碑和艺术表现上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几部电影均改编自真实事件,《湄公河行动》取材于2011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湄公河惨案”;《战狼2》讲述了退伍军人冷锋重回非洲叛乱现场将华侨顺利护送回国的故事;《红海行动》则通过中国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临危受命,前往非洲解救中国人质的惊险过程,戏剧化地再现了2015年中国海军停靠也门港口亚丁湾保护中国公民安全撤离的“也门撤侨”事件;《中国机长》根据2018年四川航空公司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烈火英雄》以“大连7·16油爆火灾”为原型,讲述了沿海油罐区发生火灾,消防人

员以生命维护国家及人民财产安全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英雄形象、抒发英雄情怀成为新主流影片的创作方向。这些作品不但完成了国家话语层面对电影创作的思想要求,“用当代中国的影像和故事表现崇高价值、国家万象”,同时也依托生于现实主义的精彩故事在人物塑造、类型审美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审美价值,它们以影像的方式向世界和国人展现了中国在跨文化、政治、军事环境中的形象、态度和信仰。

可以看出,国内新主流影片创作聚焦公共领域中的现实,源于我国电影创作的主旋律和现实主义传统。基于客观事实塑造处于真实事件中的中国形象,一定程度上是电影为保证传播效果与类型、娱乐、特技等市场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但从其接受美学意义上考量,在时政新闻热点对观众形成话题吸引的同时,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则是通过艺术呈现形成“大国崛起”的“非虚构”力量。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和国内都面临着自身身份和地位的重新调适和确定。中国梦既是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自我言说,也是中国展示给世界的名片。在当时代语境中,新主流影片唯有将中国故事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在全球文化与世界格局中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于困境与温暖的对白

——刘荣书中短篇小说创作谈

□吴媛

尽管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发展被种种文学的、非文学的因素割裂成一段又一段的代际变迁,但断裂与继承恐怕是创作内部永恒的矛盾,而这也远非“影响的焦虑”那么简单。文学作品始终是作家主体与书写对象和时代、传统乃至读者之间的对话或者博弈。

在刘荣书近期的中短篇小说中,似乎很容易找到与新写实小说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那些去崇高的冷静书写,那些“小”人物的卑微企望,那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以及来自灵魂深处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似乎不难从《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塔铺》中找到丝丝的血脉联系。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刘荣书与新写实作家“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价值观在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我们认同“文学是我们从直觉上把握生存境遇的基本方式”的说法,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他那些既务实又理想、既冷漠又温情的小说中,从那些关于出走城市又返回乡村,割断历史又寻找历史的叙述中,发现刘荣书在对新时代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和独特把握中呈现出的对精神价值的不断追问,发现他关于人在变动不居的时间、空间中的人性困境的个性化书写。文学史中可见的作家对乡土或底层的讲述往往基于这样几种姿态:或是站在现代性立场以启蒙者的姿态批判乡村的愚昧落后,或是以流寓者的姿态写一曲田园牧歌,表达同情怜悯;新时期以后很多作家更倾向于文化立场,在作品中进行文化寻根或文化批判。刘荣书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新的可能,他写乡村,写底层,沉潜于现实,并不试图加以打捞、粉饰;他与笔下的人物共情、共生,却又始终保持必要的疏离。这使他的作品整体上显得冷静而不失温情,批判却并不苛责。最可贵的是,他从不作品中人物做道德评判,却始终有着鲜明的善的指向。

刘荣书的写作不回避现实。《虚拟爱情》《雪人》以网络社交媒体为叙述背景,从交友陷阱延伸到对个体存在境遇的探究;《燃烧》以一起意外事故为切入点,抽丝剥茧般讲述意外背后的人性冲突;《他们把地球凿穿了》从一起绑架案入手,揭示了民间集资造成的道德问题和背后的社会困境。其他如《滦南姑娘》《寻书录》《盛宴》等都不同程度直面非正常死亡、争产诉讼等社会生活热点。时下关于各种事件的海量资讯以及事件背后传播媒介的倾向性解读充斥了

我们的日常生活,遗憾的是文学在这些讯息和事件面前显得过分囫圇。刘荣书的小说直接以这些事件为素材,但独特的观照视角和叙述立场使这些作品有足够的力量带领读者出离事件本身,直指被遮蔽的人性。

讲述是刘荣书小说最主要的呈现姿态。《一百零一夜》中男人、女人在对自己经历的讲述中度过又一个又一个秋毫无犯的日夜;《他们把地球凿穿了》在李馨书和杜立德的交叉讲述中逐渐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寻书录》《难以启齿的身世》都涉及如何讲述并接受个体所处的那段历史的问题。我们很容易把刘荣书对讲述的热衷和依赖比附到二十世纪哲学、文艺学的语言转向上去,实际上他的《扯票》也的确有这种特征。存在主义认为“语言不是工具而是存在本身”“不是我们说出语言而是语言说出我们”,与此相一致的是海德格尔、怀特、福柯等人对历史的叙述性特征的认知和对历史真相的质疑。很明显刘荣书受到了这些观念的影响,这给他的作品带来敏锐的哲思力量,使他对事件的观察和思考更加多元也更加深刻。但他并没有全盘接受这些观念,甚至对在这些观念影响下出现的先锋派的形式主义探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反拨。他的作品会竭力呈现关于事件的多元视角和多种讲述方式,但所有作品都遵循着“表象—事件真相—人性真相”的基本结构,展现出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揭示过程。不管对现实还是历史的讲述,刘荣书都很愿意在作品中暗示或者直接给出真相的存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质疑和解构之上。

与新写实尤其异乎其趣的是,刘荣书的小说有着明显属于现实主义的审美趣味。他会以最底层、最残酷的现实生活赋魅,将最悲惨的与最美好的并峙起来,让悲凉与诗意并存,痛楚与温情共生。《扯票》的话语环境不离城中村、垃圾场,但从头至尾却弥漫着淡淡的童话意味,文中有随口编故事的“扯票”小女孩,有关于“后母”“幸福而稳定的生活”的想象,这些表达中固然隐含着对生活本身的讽刺嘲弄,却也的确显示出向上向善的生命指向。《一百零一夜》明显有向《天方夜谭》致敬的用意,而《雾夜坦途》中那位半路搭车的大学生总不免让人与《聊斋》建立某种可疑的联系。我们似乎可以说,作家的审美想象力不仅来源于哲学、历史、文化等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更来源于他对人之存在的深刻认知,来源于不甘在喧嚣的日常生活表面前缴械投降的脱离愿望。

刘荣书以一个成熟作家的多元视角、丰富想象和鲜明而确定的生命意向,将“一地鸡毛”的现实书写从简单的认同和浮泛的虚无中解放出来,在一次次叙述的历险中努力重构新时代文学作品的精神价值,在所谓“拯救与逍遥”之外,发现文学新的目的和意义。

抒写抗疫英雄的精神风骨

评《钟南山:苍生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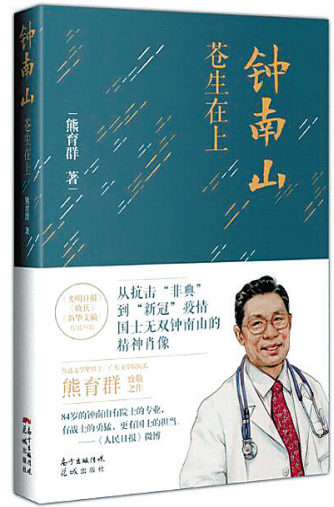
□刘佳

文学需关怀现实,作家要用激情妙笔铸就不可朽文章,书写不尽的苍生大爱与人间正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我国打响了一场气壮山河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在这场可歌可泣的战役里,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用手中的笔礼赞抗疫英雄、讴歌时代精神,一批优秀文艺作品亮相文坛。其中,《钟南山:苍生在上》(花城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有着独特的文学和现实价值。

该书是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熊育群最新创作的长篇纪实作品。全书分为六章,以事件为线索翔实记述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非典疫情的感人故事,并通过传主家风传承、求学之路、事业追求、爱情婚姻等成长历程的追述,深度再现了一位立身伟大时代、身负苍生大爱的医者形象。

书写时代精神的价值担当。从2003年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钟南山这位两度临危受命、擅医敢言的勇者,成为恐慌焦虑中带给国人信心的“定海神针”,他的科学严谨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战胜疫魔的强大动力。钟南山,这个名字已经和担当奉献的时代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作者把笔触深入到钟南山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精神与情感进行了大胆挖掘,并且打破时空,将人物置身于尖锐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记录历史,留下现场,并对此进行深刻反思。而作品中对各行各业全力抗击疫情的基层工作者群像的速写,和传主的责任担当共同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克时艰、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深入社会现场的脑力笔力。



作为纪实性文学作品,对作品的即时性要求较高。特别是为钟南山这样一位时代焦点人物作传,无疑是对写作者勇气、信心与能力的巨大考验。《钟南山:苍生在上》于今年5月在《收获》首发,此时正是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期,距离作者接受写作任务仅仅一个多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能够拿出这样一部厚重、翔实的人物传记,离不开作者丰富的前期积淀与辛苦的调研创作,也充分显示出作者强大的脑力、笔力。书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钟南山的伟大与坚毅,更深入了解到他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切身感受

到他和普通人一样的焦虑、痛苦和快乐。作者没有神化英雄,而是带给我们一个血肉丰满、可亲可敬的勇士形象。

秉笔直书的风骨精神。书中,作者忠实描绘了钟南山的风骨与坚毅:17年前,他顶住压力坚持关于疫情病原的新观点,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为抗击非典打开了新局面。17年后,钟老再次一锤定音:肯定有人传人的现象,为党中央采取严格防控措施、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科学依据。作者没有回避两次疫情初期地方政府和一些权威部门的失职与错误,而对这些内容做了忠实记述,这不仅是书写传主品格的需要,也体现出作家忠于事实、秉笔直书的精神与风骨。文学之美基于创作之真,而创作之真离不开作家的秉笔直书。在每次国家民族面临危机与挑战的重大时刻,作家都应该用手中之笔真实深刻地书写、记录时代。苍生在上,这是钟南山院士的信念,也应该为每一个良知之人所铭记。

回归故土,讲述世态万象

——评莫言新作《晚熟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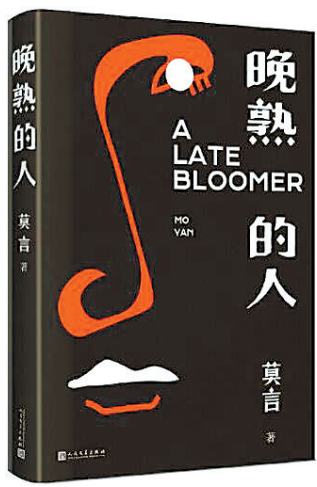
□陈华文

作家莫言自上世纪80年代起,创作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学力作。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莫言站到了前所未有的聚光灯之下,面对“诺奖魔咒”,他一直坚持创作,希望自己晚熟,使自己艺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更长久。时隔8年,其新作《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问世。

全书由12篇独立的中短篇小说构成,故事聚焦当下世情。书中,莫言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用12个故事讲述一位名为“莫言”的作家获诺奖后回到故乡所遇到的人与事。故事长短不一,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个世纪到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读者可以随着故事中的“莫言”,见证一次“衣锦还乡”之旅,也见证百态人情,万象世间。莫言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

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小说主人公贴近现实生活,仿佛就是我们身边人,正是这样的小说人物群像,组成了时代浪潮中的“常”与“变”。

在《红唇绿嘴》中那个外号叫“高参”的乡村妇女覃桂英,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最擅长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她有上百个铁杆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捧谁就捧谁,将网络玩弄于股掌之中。《表弟兄赛叶》和《玩弄金希普》这两篇小说,其中的人物金希普和宁赛叶是两个自我感觉优越,讲排面,镜“假金”,盲目自信,虚伪欺诈的假人。在现实旅行中却不乏这样的角色,他们打



着文学的旗号过着没有原则的生活,伤害别人的同时毁灭自身,永远活在一种虚假的文学梦之中。小说《左镰》的主人公田奎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少年。作品中对“左镰少年”的直接描述少之又少,仅限于他在坟墓间割草和引领“我”去看坟洞里的毒蛇。作者不忍叙说他“右手”失去的过程,而只是通过“左镰”来推进故事的发展。“左镰少年”身上寄予着作者对历史岁月对人性造成的创伤的弥合和对未来美好的期许。与文集同名的小说《晚熟的人》从“作家故里”令人啼笑皆非的“作家经济”切入,以跳跃的时间视点往返于儿时记忆与当下经验,结构起“早熟”与“晚熟”的辩证法,早熟者锋芒毕露,晚熟者深明时势,但

其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达到了生命的峰值。

小说集《晚熟的人》中涉及的地理区域,沿用了之前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这既是真实的地方,也是莫言“文学的家乡”。莫言坦言,小说里的很多人物是他的小学同学、朋友,半个世纪前的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小说里的人物跟着他一起随社会变化而变化、成长。莫言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讲什么故事、如何讲故事、故事讲给谁听,其实这并不简单。既然是故事,必然就有主题、环境、人物、起承转合等要素。小说里的人物,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片段式的,甚至可以是内心叙事式的。小说里的主人公可以性格复杂、难以揣测,而在纯粹的故事文本中,主人公的性格是不能轻易变化的,一旦变了,人物、故事、主题就会错综复杂。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就是“人学”,刻画人性的深度,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和深度。莫言讲故事的水平 and 格局,在这部小说集中再一次得到彰显。

刘荣书,1968年生,河北滦南县人,满族。作品见于《江南》《山花》《人民文学》《花城》《十月》等杂志。著有长篇小说《一夜长于百年》《党小组》,中短篇小说集《追赶养蜂人》《冰宫殿》。中短篇小说《遥远的亲人》《浮屠》《王国》《珠玉记》等曾入选河北小说排行榜,短篇小说《枪毙》《扯票》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